

B 白城记忆

白城青铜器时期的文化年代及先民的族属

●宋德辉



汉书遗址陶罐

200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汉书遗址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当时白城市境内唯一的一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更科学地揭示汉书遗址的古代遗存,文化内涵和实施有效地大遗址保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峰研究员为领队,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及全省各有关文博单位人员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对汉书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发掘从2001年7月中旬开始到10月中旬结束。这次发掘是当时白城地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钻探面积达5万平方米。揭露面积达2000平方米,共开10×10探方20个,清理各类遗迹12处,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人们对汉书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年代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研究白城古代历史及松嫩平原文化编年系列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和实物依据。

尽管目前汉书遗址发掘的考古报告还没有公布,但在纪念吉林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经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田野考古集粹》一书中,王洪峰研究员在《汉书遗址》专栏中指出:“此次发掘的成果之一是在已知的汉书一期、二期文化之外,新发现了叠压在二期文化之下的A、B两组遗存,并清理到一批晚于汉书二期的墓葬。其中下层遗存的A组遗存以台底罐、台底钵为特征,属于嫩江流域近年命名的小拉哈文化范畴,年代约相当于夏商时期。B组遗存以袋足鬲,深腹壶为代表,具有辽河、大凌河魏营子类型文化因素,年代相当于商至周初。”这里王洪峰先生指出的A组、B组,可以说是这次在汉书遗址第二次发掘中的最大收获。以汉书文化为标志,白城市的青铜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可分为四个时期。

汉书文化A组时期。主要是汉书遗址第二次发掘后,王洪峰研究员根据出土器物特征提出的。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特征与小拉哈文化年代相当。小拉哈文化是以黑龙江省肇源县小拉哈遗址第二期遗存命名的,是松嫩平原上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存,陶器基本为素面,只有少数施附加堆纹或刻划几何纹,个别陶罐的口沿下面有一周附加堆纹或沿口沿压成锯齿状花边,器形主要以直口假圈足器为主。小拉哈遗址二期陶片的热释光检测结果,年代为距今3830±34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

汉书文化B组时期。根据王洪峰研究员在汉书遗址第二次发掘后,据陶器器形特征提出B组遗存出土的大袋足鬲、深腹壶具有辽河、大凌河魏营子类型文化因素。年代3300年前后,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商至周初时期。

B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白城市嫩江流域沿岸的大安、镇赉境内,在洮儿河、霍林河下游河谷台地及附近丘陵岗地也散见分布,其中,除正式挖掘的大安汉书遗址外,采集调查有相似器形纹饰陶片的地点有,大安大架子山、镇赉坦途西岗子、通榆县兴隆山镇墩包山遗址、老富大坨子、四海泡渔场、包拉温都糜子荒北坨子等。

汉书一期文化时期。根据《大安县文物志》记载,其年代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距今3100年至2500年前后。汉书二期文化时期。根据《大安县文物志》记载,其历史年代下限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西汉时期,在距今2000多年以前。汉书文化主要分布在大安和镇赉,共有70多处,其他如

通榆、洮南、洮北等县(市、区)境内也有分布,但除汉书遗址外,其余基本都没有经过科学的发掘。白城青铜器时期先民的族属。



汉书遗址陶杯

1974年和2001年对汉书遗址的两次发掘,出土最多的器物是陶器,此外还有骨器、角器、石器、青铜器等。两次出土的陶器可以说是吉林省西部最早的一座陶器陈列馆。根据陶器的质地,可分为夹砂灰褐陶、泥质褐陶、泥质黄褐陶、磨光红灰陶等。陶器的制作方法均为手制,并采用了泥条盘筑法。陶器质地坚硬、颜色纯正,烧陶的火候较高,可达1000℃,其器形有罐、壶、钵、杯、鬲、瓮、台状支座等。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文化的陶器纹饰充分显示了白城古代先民的智慧,其繁缛的陶器纹饰凝聚着3000多年前的思维与创造。在陶器表面上刻有几何纹、绳纹、附加纹、指甲纹、锯齿纹、方格纹、划纹、刻纹、弦纹、锥刺纹、仿桦树皮纹、人首柄陶罐等。这些纹饰反映了汉书先民对生活的激情和热爱,也反映了他们原始思维中精湛的艺术水准。如果把把这些纹饰作为有机的整体组合到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将看到一幅异常生动的社会生活场景。若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他们的话,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很有成就的人。陶器上的各种纹饰告诉我们,他们不仅是手工匠人,而且是白城地区最早的最富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艺术家。

从出土的生产工具看,主要是骨器、蚌器和石器,仅蚌刀、蚌镰就有数十件之多,骨器中有磨制精美耐用的骨鱼镖、骨矛、骨镞、骨刀、骨匕、骨片、骨针、骨锥等。蚌刀、蚌镰的出土,证明当时已有农业收割工具。石器中有磨制的石斧、石锤、石刀、石镰、刮削器等。从两次发掘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分析,其经济类型是以渔猎和狩猎为主,并兼营农业及家畜饲养。也就是说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从出土的青铜镞、矛、刀、锥、扣和鱼钩等青铜器和墓葬形式看这里已开始使用青铜器,这标志着汉书一期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

尽管我们对汉书文化内涵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但对汉书文化的分布范围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现已基本明晰。即汉书文化主要分布在以嫩江中下游,松花江上、中游为中心的松嫩平原地区。我市位于松嫩平原西部,嫩江下游,在嫩江流经我市的184公里的流域内,目前查明的有70多处这一时期的遗址。面对这样规模的青铜器时期遗存,人们不仅要问,在距今2000多年到4000多年前,在今天白城东部创造如此文明的古代先民究竟是属于中国东北的哪一个民族呢?这一直是历史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指出:“考古学族属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除了古籍所记族名是否同一考古文化外,还应在文献记载,疏、注及考证和对考古学遗存的认知问题。”这如此丰富的古代遗存,不仅考古学家重视,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现就近些年来对汉书文化及与汉书文化相同白金宝文化的族属问题研究成果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我国著名东北民族史研究学者孙进己先生在《东北民族史》一书中指出:“秽貊族的居住地区很广,东至松花江流域,北至嫩江流域,西至松辽分水岭。”

东北历史考古学家干志耿、孙秀仁在1982年4月出版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中指出:“秽貊族的活动中心地区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地带。这一地区分布着西周末、春秋初期的一种青铜文化类型,即以肇源白金宝遗址命名的白金宝文化类型。据白金宝遗址一号房址测定为距今2900±年,即公元前十至九世纪。出土陶器的纹饰有仿商周青铜器的蟬纹和回纹,出土的陶器高档实用,有绳纹等,在商周陶器的演化序列中是属于较早的,因其直口、深裆、筒腹等形制的特点,又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深裆、筒腹陶器有相似之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大体与西周春秋相当。根据出土文物的对比和白金宝文化类型的绝对年代,这种文化类型的时代大体与西周、春秋相当,应是秽貊的文化。”此后,又对白金宝遗址又进行了多次发掘,白金宝一期文化已确定为距今4000年,相当我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吉林省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李殿福先生从1979年到1985年经过6年多的时间研究考察后撰文指出:“夫余族属秽貊系统,是东北古老民族之一。在两汉时代的东北,夫余族是第一个建立国家政权的民族。他们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对当时周边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汉书遗址陶器支座

《后汉书》《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谓:“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婁、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二千里,户八万。”又称:“其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国……本秽地也。”二书明确告诉我们夫余国与秽地有关,是在秽地之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史载:“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是说位在燕秦长城之北,与玄菟郡治地相距千里。作为辽西、辽北二郡北界的燕秦长城旧址,近年基本调查清楚,是从内蒙古的赤峰北、敖汉、奈曼、库伦的中部穿过,东进辽宁彰武、法库至开原,开原以东以障塞形式继续东伸。因此说夫余应在法库、开原以北。两汉时代的高句丽在辽东郡之东,高句丽的北界,在当时尚未超过辉发河。“去玄菟千里”,玄菟郡治在何方?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

开。”郡治在沃沮城,后在始元五年(前28年)因沃沮地为夷貊所侵,玄菟郡治所乃由沃沮城迁至高句丽县。这乃是第一次迁徙。后来又因高句丽逐渐强大,迫使玄菟郡再度西迁。即第二次西迁。第二次迁徙的年代史书失载,大约在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三国志)孙吴传裴注引《吴书》有“玄菟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据此第二玄菟郡治,应在辽阳以北、辽阳以东、抚顺以西的柏官屯附近的城址。夫余王城,通说在农安,近来有人考证吉林市东团山子的南城子为夫余初都之地,而农安是西徙近燕后之都城。无论吉林市东团山子之南城子古城旧址或是西徙近燕的农安亦好,南距沈阳至抚顺间的距离,恰好为千里之遥,与史书记载里数相吻合。东与挹婁为邻,挹婁在张广才岭以东,因此说夫余国的东界,未越张广才岭。“北有弱水”,弱水有人主张是黑龙江,有人主张是松花江,笔者从松花江说。“西与鲜卑接”,说明夫余国西界与鲜卑为邻。就目前考古发现看,在吉林西部的通榆已发现鲜卑文化遗存,通榆以东也有发现。因此我们初步认定夫余国的西界大体在白城至通榆再至双辽、昌图一带。在上述四至以内,恰好是松嫩平原的中心地带,是土质肥美,宜生五谷、善养牲,出名马而不产五果的于东夷之地最为平敞的好地方,此乃夫余之地域。吉、黑两省西部的松嫩平原,是西汉时代夫余先世活动的主要地区。根据近年白金宝遗址和汉遗址的考古资料显示其年代上限都在4000年左右,相当于夏商时,下限在2000年左右,相对年代应该是战国至西汉时期。这样一来,在白城地区,就考古文化来讲,其发展序列为:早期夏商(即王洪峰先生称为A组),二期为商周(即王洪峰先生称B组),三期为西周时期,即汉书一期,四期为西汉时期,即汉书二期。而这一地区又是两汉时期夫余国辖境,因此说汉书文化和白金宝文化早期是夫余族先世秽貊族(亦称索离)文化之遗存。夫余先世文化,就目前大部分在松嫩平原,即黑龙江省的三肇地区和与三肇地区一江之隔的扶余、前郭、大安、镇赉和乾安一带。大安月亮泡汉书二期文化,乃夫余国早期文化遗存的代表。这种类型文化分布范围较广。就目前所知,北到黑龙江省的富裕,东到巴彥、宾县,南到吉林省的农安、扶余、前郭,西到大安、镇赉的洮儿河、嫩江下游,属于这种类型的遗址几乎遍布整个松嫩平原。通过近几年吉林省西部文物普查看,大安汉书、前套木嘎、白沙滩、八里营、后地窝堡等处,镇赉县的坦途西岗子等30余处。“无论是夫余先世文化和夫余早期文化,都有鼎、鬲、壶,说明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据此,白城市嫩江流域内的大安市、镇赉县境内的青铜器时期古代先民的族属问题已基本清楚,即早期是夫余族的先世时期亦即索离族,晚期先民为夫余族。(九)



汉书遗址直腹陶罐

诗词鉴赏

春日

●(清)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赏析 朱熹是宋代的大学问家,被称为“朱子”。联系以前谈过的《观书有感》,我们会发现他善于观察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哲理,再通过细致的景物描写表达出来。这首《春日》诗也是这样。诗人寻了一个美好的日子,沿着泗水河漫步,踏青游赏。“胜日”既暗示了天气的美好,也表明诗人有着美好的心情。目光所及,高柳夹着堤岸,柳枝泛着鹅黄,河上坚冰融化,波光粼粼(按:此为想象,为春天应有景象,诗中所无),一望无际的空旷原野,呈现出万象更新、生气勃勃的面貌。东风吹来,带来温暖的气息,与冬日的凛冽寒风迥然不同,很容易识别。春风吹过,

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春的景象。“一时新”,一时之间换了新颜,形容变化之大;“总是春”,春天的气息广布大地,形容面积之广。诗人通过景物描写,写出了春天到来带给世界的变化,透露出欣悦之情。后人考证说,朱熹所处的南宋,“泗水”尚在金人的统治下,他不可能到那边寻芳揽胜,因此这次春日访胜当是诗人的想象。因孔子曾在泗水之滨讲学,所以这里的“泗水”象征着圣人之道。那么,朱子就是以景物做比,表达的是探求圣人之道之感触。所以“寻芳”即是寻求圣人之道,而“无边光景”“万紫千红”就是形容得圣人之道后身心的变化,而温煦的“东风”自然也写就的是诗人读圣人书如沐春风的感觉。(雨果)

成语故事

脂膏不润



脂膏不润:比喻为人廉洁,不贪财物。据《后汉书·孔奋传》记载,东汉初年,孔奋担任姑臧(今甘肃武威)县令,任职四年,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家有美食只孝敬老母,与妻子粗茶淡饭,同僚们讥讽他“身处脂膏,不以自润,徒辛苦耳”。离任之日,当地老百姓凑了牛马器物送他,以表感激之情,均被谢绝。胡赞美 石顺江图文

一写就错的汉字,你能对几个?

你挖的是“墙脚”,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是“墙角”;“谈笑风生”千万别写成“谈笑已甚”;甚至区分到你怀疑人生?下面整理了一些容易写错的汉字,赶紧收藏起来,别再当“别字生”啦!

- 71、追溯 溯
72、鬼鬼祟祟 祟
73、金榜题名 提
74、走投无路 头
75、趋之若鹜 鹜
76、迁徙 徙
77、洁白无瑕 瑕
78、九霄 霄
79、宣泄 渲
80、寒暄 喧

(五)

我看我说

让文化在人们心中发芽

●单霁翔

事实上,文物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如果有人对文物不感兴趣,有可能是没有找到自身与文物的连接点,而讲好故事可以让观众自发地挖掘到这个连接点。人们通过故宫博物院三件国宝所蕴含的一系列故事,可以知道青绿山水画创作工序之繁复及颜料提取之不易,“瓷母”烧制成功之极小几率,可以感受到乾隆皇帝“鼎盛王朝就该海纳百川”的气魄,志愿者分享文化、服务他人的赤诚无私,以及“故宫世家”质朴的家国情怀和新老故宫人的代代传承。这些知识的获得感、情感共鸣让人们观照自我,找到自身与文物的连接点。习近平总书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需要让文化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为人们的现实生活作贡献,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有本书叫《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虽然中国当下掀起“博物馆热潮”,但是参观博物馆还不能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节目中授予影视明星、文物传承保护者、志愿者等各界人士以“国宝守护者”称号,并宣读守护人誓言,其意义就在于赋予和增强人们守护国宝、传承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影视明星的带动作用 and 电视的传播力量对电视机、电脑前的大众产生积极影响,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探源历史、享受艺术、放松生活、愉悦心情。让文物活起来,需要让文化走进人们生活。文物真正让人动容的核心,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

人文精神。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86万余件文物,选哪三件参与节目?应该是那些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结合体,更能传递出有益于当下的文化内涵。最终,我们选择了《千里江山图》卷、各种釉彩大瓶和石鼓,这三件文物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了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三件国宝站在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坚实基础之上,分别从文化、艺术与物质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所铸大国梦想的历程,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才愈发坚信,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将继续创造和延续伟大的中华文明。

对文物和文化的热爱,业已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激励文物博物馆从业者继续思考和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方法。收藏是静止的、沉睡的,让文物活起来,需要我们继续系统梳理文物资源,探索更多如同《国家宝藏》节目般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式,在内容上深度挖掘文物之间的关系、文物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推陈出新,灵活运用当代人熟悉、喜爱的传播方式,从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

对文物和文化的热爱,业已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激励文物博物馆从业者继续思考和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方法

由中央电视台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9家博物馆(院)联手制作的《国家宝藏》节目,获得广泛好评。每期节目展示一家博物馆的3件重磅文物,讲述它们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崭新的尝试,彰显出连接古今、观照当下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自信。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博物馆和文物是严肃、沉重的,综艺节目是娱乐、有趣的。二者如何共处?一个共同的价值承载,就是文化。作为一种“纪录片综艺”,《国家宝藏》把纪录片和综艺节目两种形式融合运用,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纪录”是文物真实性的体现和要求,也是文物之所以吸引人的魅力所在。“综艺”是在人与文物之间搭建起来的心灵桥梁。节目首次融合了综艺、纪录片、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化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文物在人们的生活中活起来。